

善始 善成

孙涤 主编

The 25th Ceremony of
Chinese Economist Society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25 周年纪念文集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5周年纪念文集

善始善成

孙涤 主编

The 25th Ceremony of
Chinese Economist Society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善始善成: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25 周年纪念文集/孙
涤主编.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432-2315-8

I. ①善… II. ①孙…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经济学-文集 IV. ①I251②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8364 号

责任编辑 钱 敏
装帧设计 路 静

善始善成——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25 周年纪念文集

孙涤 主编

出 版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格致出版社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www.hibooks.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1
字 数 250,000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315-8/F·687

定价:38.00 元

学会和我(代序)

孙 涤

“人类是运用技能来解决问题的社会动物。在满足存活的要求后就追求两类重大的体验。第一类最深刻的追求,是运用其技能去响应挑战,这可以是击出一记好球,或是漂亮地完成一项任务;第二类最深刻的需求,则是寻求和一些同类建立有意义的和谐关系:爱及被爱、尊重及受尊重、分享经验、为共同目的而工作。”

——Herbert Simon, 1965

2010年12月10日,“CES会长会议”在南开大学开了成立25周年的研讨会,尽管天气严寒,会议开得热情洋溢。大家探讨是否编撰一个文集,以纪念学会自创办以来推进中国开放和现代化的努力,以及会员们亲历其过程的体验和感悟,或许对后来的学人还有些鞭策和启示?我把这个编辑活儿揽了下来,倒不是我介入学会工作有多深,当然更不在我对学会有多大贡献,而是深感加入学会自己获益远超过所付出的,敲此边鼓,充作对学会同仁和赞助者的些许回馈。

富兰克林曾讲过,人类历史的构成,是有些人做了值得记述的事,有些人用值得记述的字写了下来。我们这一辈,想必大家同意,是非比寻常的幸运。正像老子说的:“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道德经》第五十章)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生命的前三十年吃了点苦头,在中间的三十年做了点事情,这点事表明了这点苦没有白吃,

也为生命的后三十年能写出一点字添了素材。这种运气,委实说,我们中国人恐怕千年难以一遇的。

本书呈献给读者的,是这点字的开头。愿作者们继续做值得记述的事,并用值得记述的字写下来。我的编辑原则,是尽可能保持其原汁原味。再套用老子的话语:“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道德经》第五十四章)从读者的角度,我们会发现,作者都各抒己见,记述自己以及周边的感受,显出了真的性情。

谨代表作者们,衷心感谢陈昕、何元龙、范蔚文、钱敏等诸位朋友的支持和辛劳,使本书的编撰和出版成为可能。同时也借此机会,追谢历年来对学会的创立成长和各项工作作出贡献的不可胜计的友人和机构。

和许多朋友一样,我参加学会工作是因缘际会;成为会员后,无论在交游、观念、学养,还是职业生涯,都有意想之外的收获。令我特别感佩的,是我担任会长那届的理事会的协同。六位理事,海闻、单伟建、徐滇庆、许小年、杨昌伯和左小蕾——目前在国内都是展露头角各领风骚的人物——和本人一起挺过了一年半。按学会每年换届、会长不得连任的规矩,这可算是破天荒的。在那段日子里,我们始终能互信互谅,护送学会驶过湍流险礁,令人终身欣慰。为了不打破学会的规矩,我坚持改选理事会不要超过 1989 年 12 月底,获得了理事们一致同意,而且得到了在匹茨堡的会员和朋友们的通力合作。在徐滇庆等骨干的协调下,圣诞节前在匹茨堡成功召开了学会的第五届年会,一次真实意义上的“团结的大会”,非常难能可贵。

记得 12 月 23 日那天匹茨堡的天气奇冷,打破了多年的记录,与会者仍是济济一堂,负着使命感,来积极展望学会和社稷的前景。我的会长致辞,基于前天晚上的感悟写下的,用了一段幽默做结语:“三个人在争辩,各自从事的职业哪个最为老牌。医生称他的职业最老,自创世以来就有伤残病痛得救治,难道不是吗?工程师不以为然,争辩说若没有工程师的制造,世界怎么能够走得混沌?政治家马上奚落他们说,要是没有政治家在先,哪来的混沌!”我对学会的职责做了期许,认为我们的会员可能不擅长政治权术,却都在孜孜努力,钻研救治和生产之道,以期响应中国的需求,“China is in demand of expertise of healing, producing, and making order out of chaos. Let's keep hoping, keep learning, and keep cultivating.”

赞同我这样的期许的,包括与会的学会顾问赫伯特·西蒙。老人冒着风寒在圣诞前夕莅临致贺,令大家很感动。西蒙教授听了我的致辞居然大加赞赏,告诉我说中国人崛起的“气数”还很长(以我的理解),断不至于小挫而沮丧,致力建设终能有成果的,他甚至用了些中文的词句。西蒙签送给了我他的两卷论文集,署上了他的中文名字——司马贺,中国字竟也写得中规中矩。

前一天我为了感谢西蒙到年会来作主题演讲,同时也受我的博士导师之一比尔·库伯教授之命,去他办公室去拜望。卡内基·梅隆大学正有一座大楼要以库伯来命名,库伯曾是那里著名的工业管理学院的创始人和多年的院长。库伯老师和我的另外两位博士导师——A. Charnce 和 G. Kozmetsky 并称“三剑客”,都来自 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后与梅隆大学合并成卡内基·梅隆大学),均是西蒙的好友。比尔·库伯教授是一位极富创造力和个人风采的大师级人物,同西蒙的交情尤其深挚。西蒙在自传里通篇谈到比尔,并辟有一章专门讲述。库伯不但是西蒙在芝加哥大学的同窗,把他延聘到 Carnegie Tech 来,还介绍西蒙和他太太结成连理。在我看来,西蒙是大师中的大师,他的许多创见极具前瞻性,也是对人类文明历程的精粹解释。西蒙戏称他幸好没有沦为全职的经济学家。他那广泛的兴趣和深厚的人文关切也不允许他仅仅停留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西蒙以浩瀚的智慧,游刃有余地开拓出多种领域。比如他的经典之作《管理行为》(*Administrative Behavior*)值得人们反复研读。该书总结了人类组织四千年来的选择机制和群体行为的基本架构,切中了人类何以能够合作的要旨,历久弥新,成为众多理念的前导和经济管理研究方法的源头。

通过为学会服务,我结识了不少素质优异和学养卓越的人,或师或友,不经意间提升了自己对事理的感悟和对态势的感知能力。我介入学会的工作颇出于偶然,是经过正积极投入学会建设的陈平的引介。当时他完成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力求突进到经济学的堡垒中来,我则惶惑于经济学的牵强假设,想到堡垒外张望新途径,我俩对人文历史向来有兴趣,因此常讨论在一起。陈平作为第三届会长四处奔忙,终于在北京联络工作时病倒。行前他嘱托我代为照料文书联络事宜,遇到了这种场面,只得顶了上去代打。记得为了拓展和筹款,勉为其难拟写过不少信件,同知名人士和机构接洽,想方设法来推介学会,其中包括台湾地区的经济政策研究重镇“中华经济研究院”的院长蒋硕杰。

蒋先生是有数的前辈经济学家,望之弥高,与他书信往返,自是翼翼小心。

1990 年我第二次台湾之行,蒋硕杰约见,其时他年高已不每日办公视事了。到了他的办公室——研究院行政楼左侧的一栋小楼里,蒋先生已在等候了。我们交谈了许久,并没有涉及经济学和经济形势的内容。蒋先生有兴趣的,是我们这一辈在大陆是怎样进学的。承他频频垂问,我有无家学的渊源,又如何在闭锁的状况下汲取有价值的信息之类。待走出他的办公室,陪同的于宗先院长告知,蒋先生如此长时间细细询问对后进学子是殊为难得的,看来他对我的印象甚佳,我才省悟到,蒋硕杰准是看重了我撰写的信件,以及繁体字的书法。个人的修习,包括平时练的书法和读的经典古文,有时真还派点用场呢,而老人家关切的,恰好是在文化的传承方面。

学会能够安然度过 1989 年,并非水到渠成之事。当年和经济学会同样方兴未艾的大陆留学生团体,譬如政治学会,有不少就垮于一旦。

那年八月政治学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召开,我应邀出席。当时的我怀有一个简单的念头:作为看护人我有无可卸贷的责任,学会无论如何不能在我们手里夭折。我挪后年会和推迟改选的提议得到了理事会和广大会员的认同。果然,冷却了几个月后,我们在匹茨堡年会得以平顺交接工作,产生了新的理事会,学会也略无波折地驶入坦途。对此我们深感宽慰,这也许是本届理事会尽责工作中的最大一件。我们这一届还在陈平会长和张欣会长之间,承上启下,做了不少建设性的努力,纪念文集的各篇也提供了不少记述。其中《中国经济评论》的创立,是由单伟建理事主持的,有着深远的意义,开启了学会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登堂入室的历程。

我去美国相当早,尤其是作为自费留学生。所谓自费,实际上靠的是申请美国学校的助学金,这个主意来自在上海财经学院(现称上海财经大学)帮助培训财政部司局级干部的美国专家的指点。当时我在上海财大读国际金融的研究生,英语尚过得去,担任了美国专家们的助教。他们告诉我,在美国读研究生课程可以不必自己花钱。于是靠他们帮忙,我被几所大学录取并申请到了助学金。但出国护照却被留难,理由是研究生已在国家要重点培养的“人才”之列(当时研究生的录取率在 2% 以下),不可随便流失,因此误了八月开始的秋季学期。后来有了转机,据说是上海有一个在读研究生的高干子弟也要“自费”出国,因此特许放行,一共 16 人,我是 15 个“搭便车者”之一,可以说这是我享受制度搭便车好处的唯一一次。我 1981 年底经香港飞抵美国,但误了学期,不能进几个更好的学校(包括

宾大和布朗大学),只得到南伊利诺伊大学(Carbondale)插读春季班。离开上海之前我曾被到访的普林斯顿经济学院院长面试,他应承录取我,不过次年秋季才能入学。当时自己心里颇不踏实,没敢把目标设得太高而舍弃了,也因此失去了和杨小凯、于大海等成为同窗的好机会。

说来有点奇怪,我到美国后从来就没有感到过冲击,不论是文化还是语言上。我的英语靠自修,主要得益于“窃听”短波收音机里传来的“英语九百句”,当然也常听“美国之音”,因此对西方社会多少有些了解。至于经济学的训练,是在上海财大的图书馆里苦读出来的。那时财大的研究生院蜗居在中山北一路的一栋小楼里,三层有个图书室,只对教授和研究生开放,藏有数千册财经类书籍和期刊,大部分是1980年初美国来沪展览图书后留下来的。我视其为宝藏,整日挖山不止,也算打下点儿基础,替我的留学生涯做了些铺垫。

我感到的冲击,倒是在抵美后的第一站伯克利校区,在奥克莱的中国杂货店,所谓“屋崙马脊”里看到,从国内进口的桂圆、粉条、红枣、梅干菜,色色齐备,都是国内非年节凭票买不到的。同样的冲击还来自我1990年初返回国内的经验。那年初春我卸任会长,兑现了向福特基金会做过的承诺,率队回国考察。福特基金会是学会初期最主要的赞助机构,主持其事的盖斯纳是日后颇有名气的美国财长的父亲,小盖斯纳还在北京游学了一阵子呢。他们忧虑“六四风波”以后中国的发展前景,敦请对两边都有了解的学会会员去做一个评估。我和新任会长张欣和日后的会长海闻,在两种气候都还冰冻的情势下成行。当夜晚走出住宿的北京饭店,我看到路边摊的小贩在料峭寒风中守候,向行人兜售新鲜的葡萄、哈密瓜时的殷勤劲儿,不由得感到冲击:我去国不过十年,经济和物资供应从匮乏到丰盛,竟有如此巨大的改进,发展是硬道理,难道还需要什么理论来佐证市场的伟力吗?

不过,市场带来的纠结也始终存在。记得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Columbus)读硕士时,因为拿了奖学金无需打工,就去听了E. Kane教授的货币银行学高级课程,他是该领域的权威,尤其对金融监管有深入研究。当时里根政府力主的“解禁”政策(deregulations)正在展开,学界和业界一片叫好。Kane教授并没有一面倒,他告诫学生,要关注规制和解禁在现实世界的博弈历程,成效如何还在于“度”的合理把握。后来我在得州大学(Austin)念博士的时候,正值美国以反托拉斯的名义把AT&T肢解成八个子公司,Charnce老师做案例分析时也提醒学生,要跟踪长程效应,评断利弊若只从理念或原则着眼,偏误会是很要命的。80年代留美

的经济学生想必记得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在 *Newsweek* 上对峙的专栏笔战,两位泰斗过招许多回合,可谓脍炙人口。当时读了直觉过瘾,许多年后才悟出其中的门道:两派为之纠缠的,可以归结成一个字——“税”,其余多半是藉口或粉饰。政府孰大孰小,归根结蒂,是“这些是我应得的,你不能拿走”和“那些是我应得的,你得还给我”之间的争论。而唯有国家,现代文明唯一“合法的有组织的暴力”,才有“合法的权威”,把经济利益以税和费的名义在各个人群之间合法地分配来分配去。

在替学会工作的过程中也多了机会,考察美国深层次运作的潜规则,这是教科书里读不到的。当时美国在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上争议极大,我在会长任期里,颇受到压力。从媒体从机构甚至从参众议员那里,有不少到美国国会去作证支持制裁中国的要求。我们理事会定出了约束:任何会员不得以学会名义参加这类活动,而作为个人,务必本着学术的严谨和自己的良知来审慎对待。本人在回应这类要求时总是秉承这个原则,坦诚告知对方,我们的会员中有不少的确具有作证的专业水准和操守,但是不能保证会员个人的证词一定会符合要求方预设的立场。事实上,不少此类要求临了都不了了之,而我们绝大多数会员也都恪守了作为中国人的底线。这给我相当深刻的教训,在博弈竞争中人们追逐的正是自利,而不是相互标榜的原则,印证着现代经济学的开山祖亚当·斯密的教诲。

中国致力于把国家的合法权威提升为现代社会的税制,路程漫漫,但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取得了长足发展,已经登上全球舞台进行大规模的博弈,如何掌握自己的话语权已是无从回避的了。不过直至今日,在世界博弈规则的制定上,中国还只是一个跟随者,怎样争取成为制定者,对此经济学人是责无旁贷的。这令我回想起 1986 年在波士顿召开的第二届年会,当时的年轻人感奋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显著进展,盼着经济学诺贝尔奖不久能落到中国人的头上。将近三十年过去了,这顶桂冠还难见踪影呢。诺贝尔的奖酬其实没那么重要,在竞逐文明的过程中,我甚至想,你要是能把人类是如何展开“抱团竞争”的(市场竞争不过是其中之一,虽说 95% 的人的 95% 以上的生命都耗在里面打拼),把“我”与“我们”,以及“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博弈机制给整明白(Me vs. We, and We vs. Them),功业不就尽在其中了吗?

总之,市场和制度乃博弈的结果,在演进中竞取,无法由天赋而浪得,这在西方人如此,在中国人如此,在阿拉伯人亦复如此。无法靠设计出的人,无论是特蕾

莎嬷嬷、雷锋叔叔,还是所谓“彻底理性的经济行为人”,来制定和贯彻奏效的政策。我们不得不回溯演化的历史找其线索,深入到演化中铸就的人脑构造内部找其依据^①,才有可能洞悉人类的本性和人类合作的条件。对此,我愿意借用哈佛的知名学者,昆虫学和文明演化大师 E. Wilson 教授的一句断语来表达:“在群体内部,利己者占优利他者;在竞争群体之间,利他群体战胜利己群体。唯此为大。”

1991年春,我搬到洛杉矶不久,杨小凯来访,他那时已到了澳大利亚执教。在我家彻谈竟夜之后,次日找林毅夫晤谈,他当时在洛杉矶加大客座。午餐后我们去盖蒂美术馆参观,那里耗资九千万美元购得了梵高的一幅名画《鸢尾花》。我们三人在画前伫立良久,感触梵高的穷愁一生,生前一幅画都没能卖出,却给后人如此崇高的享受。毅夫兄突然冒出一句话:“我们欣赏了这么久,到底该付多少,才报答得了梵高?”一个典型的经济学计算。而令我心有戚戚的,梵高追求的高远思路,也许他没有自我意识到:付出和回报,往往不能在一笔交易或一个时点上结算得清楚。经济上的“均衡”不也如此?必得拓宽视野,从长程着眼,方能解释完整。

① 深入发掘和剖析人脑的“战役”——Brain Initiative 已在美国发动,被看做是继“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后最重要的科研工程。

二十年来人的认知科学和行为科学,以及脑神经科学和实验心理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逐渐揭示出人类理性的固有倾向及其局限对市场博弈的影响。无论从人内在的大脑活动还是其外显行为,都提供了充足的观察实据,表明人拥有“无限的”私欲、意志力和谋算能力(boundless selfishness, boundless will power, and boundless computability),来贯彻一己的追求的看法,是严重的“迷思”。从演化发展的角度,我们甚至可以说,人“天生”就不具备这类“无限的能力”。科学实验、神经影像学和分析工具的突破,为人脑功能及其后果的定量解析,最终能在一定程度的反馈调节提供了可信的证据,并为进一步理论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目 录

学会和我(代序) / 孙 涤	001
在纪念留美经济学会成立二十周年圆桌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 于大海	001
西天取经和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 林毅夫	003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长道路 / 陈 平	011
回忆留美经济学会初创期 / 茅于軾	023
经济学者的两难选择:“是否回国?” / 樊 纲	026
创办《中国经济评论》(<i>China Economic Review</i>)的始末 / 单伟建	046
回忆留美经济学会初期 / 张 欣	057
个税扣除额调整的经济学与政治学 / 华 生	061
回望 CES 25 年:责任·使命·国家 / 田国强	068
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内在逻辑 / 易 纲	077
光荣与梦想 / 徐滇庆	097
经纶济世一代英才——追忆杨小凯 / 尹尊声	114
论经济危机 / 刘 吉	119
CES 的财务制度建设:财务管理委员会 / 俞 卫	141
平台、奉献、海归 / 陈爱民	146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市场改革与经济启示 / 鲍曙明 张晓欢	154
团队精神、学术至上、与时俱进——浅谈会长体会 / 宋顺锋	177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靠什么? 论两只看不见的手 / 刘国恩	180
和留美经济学会一起走过的日子 / 李海峥	195
受恩泽、思回报、得造就、图发展——和留美经济学会一起成长 / 王 红	208
“CES 会长论坛”侧记 / 王艳灵	215
破浪前进的龙舟:学会会标的设计理念 / 陆 丁	225
历届理事会名单	230

在纪念留美经济学会成立二十周年圆桌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于大海

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回顾留美经济学会的发展历程。虽然我目前无法回到国内与大家欢聚一堂,我的心却是与各位紧紧相联的。在学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我愿和大家一起为我们的学会祝福,祝愿她在以后的二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里,继续为祖国的繁荣进步作出贡献!

我们的学会是在 80 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应运而生的。那时在海外攻读经济、管理专业的留学生还不太多。这些留学生希望有机会回报祖国,但看不清将来的出路,学业上也面临种种困难。我们创建学会,既是为了提供一个大家交流经验、切磋学问的机会,也是为了设法使海外学子与国内的改革开放事业挂上钩。当然,更广义地说,也是为了追求多少代仁人志士振兴中华的共同理想。为了创建学会,我和几个朋友不顾学业的压力,在筹款、法律注册、安排年会、编辑会刊以及制定学会章程等方面都投入了大量心力。但我们的能力毕竟很有限。我参与筹备学会时,还只是个二十三岁的学生。学会能够很快得到广泛的支持和参与,正印证了“形势比人强”的说法。

在当时,改革开放不仅深得民心,也开创了计划经济国家全面引进市场机制的先例,在国际上被视为奇迹。学会的创建当然很不易,但学会同时也是时代的宠儿,占得天时、地利和人和的机遇。由于学会与改革开放有明显的关联,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基金会,甚至媒体都很乐于助学会一臂之力。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和福特基金会的盖纳先生,给予了我们决定性的帮助。在学会与国内的早期交流中,社会科学学院的茅于軾先生和国务院体改所的陈一咨先生为我们大开方

便之门。学会的筹备者和最早一批会员也真正做到了精诚合作、亲密无间。有机会担任学会的首任会长,是我自己人生中永久的骄傲。

留美经济学会的一个特别之处,是她刚一诞生就显露出当时在中国人团体中较少见的几个特征。第一,学会是由一批背景相近的学人独立注册、自行管理的;第二,学会以学术为纲,与政治保持距离;第三,学会严格遵守章程,以民主选举的方式推举负责人;第四,学会的负责人将学会视为社会公器,任内尽职尽责,任后甘做普通会员。我想,学会后来的稳步发展,是与她保持了这些特征分不开的。

喝水不忘挖井人。在庆祝学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我愿表达对已故的邓小平先生的敬意。他所鼎力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但为留美经济学会的创建和成长提供了条件,更为近年来的高速经济成长奠定了基础。他的眼光、勇气和实干作风,很值得后来者效法。我也愿表达对已故驻美大使韩叙先生的敬意。在他担任大使期间,驻纽约总领事馆为学会的成立大会提供了场地。学会首期会刊于1985年10月出版前,我提出请韩叙题个词。为了不耽误会刊的出版,韩叙在出席党的十二大及十二届四中、五中全会后刚一回到美国,就为会刊题了词。我还要表达对已离世的学会创始人之一杨小凯先生的深切哀思。小凯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也是我亲如手足的挚友。在创建学会的过程中,小凯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办法,作出过难以估量的贡献。

多年以来,在历届负责人和众多会员的共同努力下,学会对国内的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每次看到学会取得新的成绩,我都感到十分欣喜。在此,我也愿向对学会的成长付出了辛勤劳动的所有会员致以敬意。

过去的二十年是充满变化的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里,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的经济实力成倍增长,留美经济学会也从一个学生团体发展成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学术重镇。但尽管世事沧桑,天道仍有其不变之处。依我看,学会促进祖国繁荣进步的功能没有变,会员间珍重友谊、相互提携的风气也没有变。我相信,在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学会一定会在未来的岁月里保持她的优良传统,更好地执行她的历史任务,取得更辉煌的成绩!

西天取经和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很高兴有机会再次到中国人民大学来讨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一些问题,尤其让我感到特别荣幸的是在 Joseph E. Stiglitz 教授之后做主题发言。记得在 1995 年的时候,《经济研究》创刊 40 周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本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的祝贺文章,在文章里我提出中国经济学家要以规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的问题,这样研究的成果就有可能对国际上经济学科的发展做贡献。同时,我还提出一个命题,预测 21 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我们很可能迎来国际上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的到来。

现在已过了十年的时间,重新回顾当初提出的命题,我对这个预测实现的信

^{*} 本文根据 2006 年 3 月 18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现代经济学教育:共性传承与个性彰显”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在世行工作这三年,恰逢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这场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看到主流经济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到来既未能有前瞻性的预警,爆发后在危机处理上也捉襟见肘,抱残守缺,未能提出有效的对策。同时,反思了发展经济学自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门独立分支以来,凡是按照主流发展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多乏善可陈,而经济发展成效卓著的国家,其政策从当时主流的理论来看经常是离经叛道;这种现象同样也存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问题上。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 5 年前谈的中国经济学学科本身和经济学教育的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命题,现在、在未来都还很重要。

留美经济学会成立 25 年来,对现代经济学在我国的普及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喜可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成就很大,有待解决的问题也很多。如何提出新的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解决伴随出现的问题,这既是中国经济学学科发展,也是留美经济学会诸位朋友所共同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应孙添主编邀约,将此旧文借《25 周年纪念文集》之一角发表,请留美经济学会的诸位朋友指正。并感谢孙添对文中个别文字的修正。

心不仅没减弱而且是增强的。当时我认为 21 世纪很可能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首先是根据任何经济学理论本身是一个用来解释、说明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些经济现象的简单逻辑体系这个事实。因为理论本身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而且,大多数重要理论的逻辑经常是很简单的,因此,一个理论不能从其逻辑本身来决定是否重要。其实,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这个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现象越重要,能够解释这个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的简单逻辑体系就是越重要的理论。

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毫无疑义中国经济本身以及中国的经济现象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了,中国的经济总量按汇率计算虽然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但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是美国的 3—4 倍,从增量来说已经达到美国的一半。如果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来计算,中国现在经济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一半,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量因此已经超过了美国。在国际贸易方面,中国则已经是全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加入 WTO 以后,每年的对外贸易增长率超过 25%。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增长影响了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一两年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中国热”,所有的主要媒体、杂志,都以大篇幅报道中国发生的事情。国际上许多非常有影响的顶级经济学家,包括像 Joseph E. Stiglitz 教授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中国的常客。中国热背后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大家都想了解中国的经济现象。

我认为我们很可能迎来国际上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的到来,原因还在于中国的经济现象提供了许多进行理论创新的机会。经济规模大,发生在这个经济体的现象就重要,但是一个经济学家要成为经济学大师还要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理论的创新总是来自于一些新的未被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以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来说,30 年代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大萧条,不能用新古典供给和需求均衡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于是产生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到了 60 年代出现了滞胀,通货膨胀并没有像凯恩斯主义所预测的那样带来就业增加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因此出现了理性预期理论。到了 90 年代,经济学家们又发现政府确实是可以利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对经济进行微调,因此,又出现了新古典综合理论和新凯恩斯理论等。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许多用现有的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简单地举两个大家熟悉的例子来说明:第一个是,中国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渐进

式改革到了 80 年代末已经取得了连续十多年快速经济增长的成果,但是当时主流经济学界对双轨制的改革普遍抱着非常悲观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随时会出大问题。那时在主流经济学界广为接受的一个看法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双轨制”经济不如原来的计划经济。而且,认为要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改革就应该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休克疗法,理由是一个经济体系要有效运行必须有一定的制度保证,包括价格由市场决定、产权私有、政府平衡预算。经济学家通常对很多问题意见分歧,但是, Larry Summers 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主流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何转型,却出乎预料,有了以“休克疗法”来改革才会成功的共识。但是,中国经济 1978—1990 年的年均增长率是 9%, 1990—2005 年的年均增长率则提高为 9.9%,并没有像当时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预测那样出现崩溃或是停滞。苏联、东欧在进行了“休克疗法”以后,也没有像主流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经济出现快速增长,反倒是崩溃、停滞了,而且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许多国家还未恢复到转型前的水平,绩效比较好的东欧国家各方面跟中国比较起来还是远远不如。

另外,最近的一个例子是 2000—2002 年间,国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假的,争论的原因是我国从 1998 年开始出现通货紧缩,物价年年下降。在国外出现通货紧缩,一般经济会非常疲软,增长速度为零甚至是负的,只有在政府强力的财政政策支持下增长速度才可以比零略高一点。最明显的例子是 30 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和在日本 1991 年开始的通货紧缩。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 1998 年 7.8%, 1999 年 7.1%, 2000 年 8.0%, 2001 年 7.5%, 2002 年 8.0%, 是这段时间里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于是认为我国的 GDP 增长速度不是真的。而且,1997 年我国的能源使用下降 0.8%, 1998 年下降 4.1%, 1999 年又下降 1.6%,一般认为 7%或 8%的经济增长是非常高速的增长,高速增长时能源使用应该是增加的,但是中国的能源使用却在下降,这更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怀疑。于是,匹兹堡大学的 Thomas Rawski 教授首先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问题,官方公布的数字不真实。按他的研究,顶多是 3%,很可能是接近零增长,这个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被广为引用。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经济学家,现在则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比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高而不是低。

从上述的例子可知,国外主流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的许多预测后来证明是不

对的。Thomas Rawski 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真是假的争论,有些人会说他是中国观察家,不是顶尖的经济学家,不足为道。然而,向苏联、东欧推荐“休克疗法”,认为休克疗法会在短期内给苏联、东欧的经济带来快速转型,以及效率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同时,又对中国“双轨制”改革抱着悲观看法的经济学家中,绝大多数是主流的经济学家,而且很多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大师对这么重要的经济问题开出的药方、做出的预测,结果却与后来发生的事实不符,其原因应该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些大师不懂经济学,二是现有的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本身有问题。现代经济学中的许多新理论进展是这些大师发展出来的,因此,他们不可能不懂经济学,问题应该出在现代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上。

其实,不仅现在经济学教科书里和主流文献上的许多理论在解释中国和苏东的转型问题上无能为力,而且许多有关经济发展的理论也出现了同样的困境。二战以后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开始自主地追求经济发展,可是,经济学界里众人共知的一个事实是,五六十年代,按照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都很糟,而发展比较好的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经济政策从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看却是不对的。前天 Stiglitz 教授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时说了一个笑话,他说有人认为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非常成功而拉美非常失败,是因为中国台湾到美国留学的学生中,工程师回到故乡从政,经济学家留在美国教书,而拉美的留学生则相反,经济学家回国主政,工程师留在美国工作。虽然只是一则笑话,但确实刻画了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所遇到的窘境。

和五六十年代相比,现代经济学在增长和发展问题上已经有了许多新的理论进展,问题是这些理论进展是不是就真正揭示了一个经济发展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比如说新古典增长理论强调物质资本积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转为强调人力资本积累在技术创新上的作用和经济的规模效益,认为这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成败的关键。然而,亚洲四小龙和日本这些追赶成功的经济体,在她们追赶阶段时,其教育总体水平比发达国家低,而整体经济规模也比发达国家小。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固然没什么疑问,但它要是关键的决定因素的话,那么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较低、规模又较小的东亚经济应该是无法赶上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差距的。另外,社会主义国家中,像苏联、东欧、古巴等的教育水平,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逊色,甚至有过之。如果说高教育水平并不